

论苏轼对刘禹锡诗歌的创作接受和理论发展

洪迎华

摘要：苏轼虽然曾就刘柳参加王叔文革新集团一事对二人进行抨击，但在诗歌创作上对刘禹锡仍多有取法。由于政治命运、个人心性的某些相似，苏轼在政治抒情诗的写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吸取了刘诗的讽刺艺术，其它题材和风格的诗歌创作，如《竹枝词》、意境奇幻的作品等，两者之间也存在着艺术渊源关系。在“虚静”成诗和“象外”之境的诗歌理论上，苏轼对刘禹锡也有继承和发展。由于苏轼本身在北宋文坛及整个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他的接受无疑是刘禹锡诗歌整个接受史上重要一环。

关键词：苏轼 刘禹锡 接受

凡文学大家，无不对前人的优秀成果转益多师、兼收并蓄，然后融入个人和时代的因子予以创造性的超越。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云：“苏子瞻胸有洪炉，金、银、铅、锡，皆归熔铸。其笔之超旷，等于天马脱羇，飞仙游戏，穷极变幻，而适如意中所欲出。韩文公后，又开辟一境界也。”此话形象道出了苏轼在学习前辈诗人的基础上所取得的诗歌艺术成就。从苏轼一生的创作来看，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等大家都对其产生过影响。另外，中唐诗人刘禹锡也是他在诗歌创作中多有取法的诗人。对此，宋人的诗话、笔记中多有记载，如曾巩《后耳目志》：“东坡平生诗学刘梦得。”陈师道《后山诗话》：“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学不可不慎也。晚学太白，至其得意，则似之矣。”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苏子瞻学刘梦得，学白乐天、太白，晚而学渊明。”虽然观点不尽一致，但都认为苏诗曾接受了刘诗的影响。这些说法也透射出，苏轼对前人的学习不拘一格，随着人生历程和创作阶段的变化，他在艺术上所师法的对象和诗歌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变化。那么，苏轼对刘禹锡的接受情况究竟如何？他的接受有无时段性？在接受过程中，他所取法的内容是什么？对这些问题，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刘郎”与“桃花”：苏轼对刘禹锡政治讽谕诗的创作接受

在刘禹锡和苏轼的诗文创作中，反映社会问题、干预社会现实的讽刺诗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由此二者的创作呈现出某种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不只表现在类似题材所富有的社会价值、现实意义等方面，而且还表现在这类诗歌背后的创作背景、诗人人生际遇和个性气质上。

首先，刘氏和东坡的讽刺诗创作都与政治革新有关。刘禹锡的政治抒情和讽谕诗主要写于永贞革新失败、“二王八司马”遭受贬谪之后，用以表达诗人心中的愤慨、不屈的意志和对政敌的蔑视。如《聚蚊谣》、《飞鸢操》、《百舌吟》等诗篇，托物以讽，既形象揭露了政敌的丑恶面目和害人行径，又充分表现了自我的坚定信念和乐观精神。苏轼主张“诗须要有为而作”^①，“见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漠视也。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

^①苏轼：《东坡题跋》卷二《题柳子厚诗》，第一册第37页上，《丛书集成初编》本。

几有补于国”^①，反映民生疾苦、干预社会现实始终是他创作中的重要主题。不过，苏轼政治讽喻和抒情诗中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还是其站在保守党的立场上，因与新党政见不合而写下的讥评时政、反对新法的讽刺之作。

其次，刘禹锡和苏轼都有因诗歌语涉讽刺而被贬的人生遭遇。刘禹锡经历了十年的贬谪生涯被召返回京后，曾借写长安玄都观桃花之盛，寄寓感慨，讽刺朝廷新贵和趋炎附势之徒，这就是著名的《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其诗一出，传于都下。有素嫉其名者，白于执政，又诬其有怨愤”^②，不数日，他就被再贬为连州刺史。苏轼在王安石推行新法两年后，因议论不合而自请外任。在任杭州通判等职期间，写下了《山村五绝》、《吴中田妇叹》等诗揭露和讽刺新政所产生的种种弊端。元丰二年他移知湖州期间，即以讪谤新政的罪名被捕入御史台狱，随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刘、苏二人在创作政治讽刺诗方面的相似，还表现在他们都好讽刺和不妥协的“硬汉”性格上。刘禹锡因《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语涉讽刺，执政不悦”^③导致再贬，据《新唐书》本传记载，大和二年，他“由和州刺史入为主客郎中，复作《游玄都》诗，且言：‘始谪十年，还京师，道士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过之，无复一存，唯兔葵、燕麦动摇春风耳。’以诋权近，闻者益薄其行”。虽然有写前诗“以志一时之事”而遭受打击报复的深刻教训，诗人往事重提的旧题再作，依然对政敌和现实极尽蔑视和嘲讽，表现了自己不屈的意志和不变的信念。此次创作虽没有再次导致贬谪的不幸，但却在史家笔下落得了个“益薄其行”的议。苏轼的“好讽刺”也是时人所公认的。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四云：“东坡文章，妙绝古今，而其病在于好讽刺。”杨时《龟山集》卷十《语录·荆州所闻》云：“观苏东坡诗，只是讥诮朝廷，殊无温柔敦厚之气，以此人故得而罪之。”就连追随他的学生和好友黄庭坚在《答洪驹父书》中也认为：“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可也。”苏轼因“讥诮朝廷”而被贬，即使是在被贬之后，他也没有放弃对现实的关注和批判。虽然，刘禹锡的怨刺在根本上源于他对革新理想的坚持和政敌攻击的不服输，而苏轼的“好骂”则源于其“时之不可以合，又不可以容”^④的不平心境、及“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的现实主义精神，但两人在心有不满则敢言、屡遭打击亦不屈的“硬汉”性格上颇有相似之处。

由于他们在政治层面上有以上种种相似，苏轼在诗歌创作中对与自己脾性相近的刘禹锡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并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有意无意地吸取了其讽刺诗的手法。比如，在刘禹锡《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和《再游玄都观绝句》两诗中，“桃花”意象和“刘郎”形象被赋予了鲜明的历史内涵和丰富的美学意蕴。而在苏轼的诗词中，他即多次直接引用“桃花”、“刘郎”的典故或这两首诗的语词和意义，如：

秋色渐摧颓，满院黄英映酒杯。看取桃花春二月，争开。尽是刘郎去后栽。（《南乡子·席上劝李公择酒》）

①苏辙：《栾城集》后集卷二十二《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四部丛刊》本。

②孟棻：《本事诗》“事感第二”，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第12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③刘昫：《旧唐书》卷一六《刘禹锡传》，第十三册第4211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朋万九：《东坡乌台诗案》“游杭州风水洞留题”，《丛书集成初编》本。

情未尽，老先催。人生真可哂。他年桃李阿谁栽。刘郎双鬓衰。（《阮郎归·苏州席上作》）

秋风昨夜入庭树，莼丝未老君先去。君先去，几时回？刘郎应白发，桃花开不开。（《送刘放倅海陵》）

年年岁岁何穷己，花似今年人老矣。去年崔护若重来，前度刘郎在千里。（《留别释迦院牡丹呈赵倅》）

上苑天桃自作行，刘郎去后几回芳。厌从年少追新赏，闲对宫花识旧香。（《刁景纯赏瑞香花忆先朝侍宴次韵》）

东坡诗里，或“刘郎”与“桃花”并引，或只取“刘郎”一词，或援用刘禹锡创作看花诗的整个典故，也有一首诗歌化用刘禹锡多处诗文的，如《送刘放倅海陵》中“昨夜秋风入庭树”和“刘郎应白发”两句还分别源于刘禹锡的另外几首诗：一是《秋风引》：“何处秋风至？萧萧送雁群。朝来入庭树，孤客最先闻。”二是《团扇歌》：“秋风入庭树，从此不相见。”三是《征还京师见旧番官冯叔达》：“前者匆匆襦被行，十年憔悴到京城。南宫旧吏来相问，何处淹留白发生。”苏轼在诗中将其极其自然地糅合在一起并化为己用，表达了内心的惆怅和隐忧。不仅是桃花，诗人在对其它花种如梅花、牡丹的描写过程中也巧妙地化入了“刘郎”看花的故事。

苏轼和刘禹锡政治抒情诗的最大相似，是他们在诗中频繁使用寓物、托事以讽的表现手法，使得作品流露出强烈的讽刺意味和现实指向。刘氏在看花诗中借写桃花的盛衰讽刺政敌，苏轼的咏花诗中也有以花讽喻的，如其《和述古冬日牡丹四首》其一，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四记载：“杭州一僧寺内，秋日开牡丹花数朵，陈襄作绝句，某（苏轼）和云：‘一朵妖红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此诗讥当时执政，以化工比执政，以闲花比小民，言执政但欲出新意擘画，令小民不得暂闲也。”刘禹锡写于贬谪期间的大部分政治抒情诗，如《飞鸢操》、《昏镜词》、《调瑟词》、《聚蚊谣》、《百舌吟》、《有獭吟》、《养鸷词》等，皆用寓言诗的形式托物讽喻，以揭露时弊、斥骂政敌和抒忧泄愤，故《东目馆诗见》有言说：“梦得主怨刺。”^①苏轼干预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诗歌虽然也偶尔采取直接暴露的手法，但他最擅长、数量最多的也是“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从侧面进行讥刺的诗歌。如他的《山村五绝》借描写山村农民艰难的生产和生活环境，讽刺王安石新政中的青苗法、农业劝耕、食盐专卖等政策。《东坡乌台诗案》中记载更多，如《八月十五看潮五绝》其四言“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目的是“讥讽朝廷水利之难成”，《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之二言蝗虫、盗贼、灾伤、饥馑之甚，亦是“以讥讽朝廷政事阙失，及新法不便之所致也”。这样以事、物托讽的政治讽刺诗不仅比刘禹锡更多，而且讽刺内容更具体、讽刺意味也更强烈。

二、“山围故国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苏轼与刘禹锡在其它诗歌创作上的渊源关系除了从刘禹锡那里得到了怨刺笔法，苏轼在其它诗歌的创作中也接受了刘禹锡诗歌的

^①陈伯海：《唐诗汇评》第1805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影响。

刘禹锡在《竹枝词》艺术上的卓越成就和开创之功为世瞩目，以致后来的创作者多受其影响。苏轼也是如此，他曾感叹赞美刘禹锡的《竹枝词》是“奔逸绝尘，不可追也”^①。在九江送苏伯固往澧阳时，他曾作《归朝欢》词云：“君才如梦得，武陵更在西南极。竹枝词，莫徭新唱，谁谓古今隔。”也流露出对刘禹锡《竹枝词》的倾慕之情。

受刘禹锡的启发，苏轼曾创作了一组《竹枝歌》。《竹枝歌》小引云：“且其山川风俗鄙野勤苦之态，固已见于前人之作与今子由之诗。故特缘楚人畴昔之意，为一篇九章，以补其所未道者。”此“前人之作”，当是指刘禹锡反映风土民情的《竹枝词》九首。正是继承了刘禹锡“一篇九章”的结构形式，并出于“补其所未道者”的动机，苏轼在内容上进行了新的拓展，开创了以竹枝词咏史之先河。

苏轼的诗歌尤其是古诗具有奇逸奔放、波澜壮阔之美，相同的审美趋向，使他对刘诗中想象恢宏、气象阔大和意境奇幻的作品表现出了特别的关注和欣赏。他曾手书刘禹锡据别人提供的材料、凭借想象写成的雄奇壮幻之作《有僧言罗浮事因为诗以写之》，并作有《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诗中自注云：“刘梦得有诗，记罗浮夜半见日事。山不甚高，而夜见日，甚可异也。”这说明，苏轼此诗的创作直接受到了刘诗的影响。刘诗云：“咿喔天鸡鸣，扶桑色昕昕。赤波千万里，踊出黄金轮。”苏轼诗中有：“人间有此白玉京，罗浮见日鸡一鸣。”另外，苏轼《韩太祝送游太山》中“恨君不上东封顶，夜看金轮出九幽”句，亦体现出向刘氏诗句学习的倾向。刘禹锡还有一篇凭虚构象、语奇景幻之作《客有为余话登天坛遇雨之状因以赋之》，清人施朴华《岷佣说诗》评之曰：“变化奇幻，已开东坡之先声。”便慧眼指出了两人在此类风格作品之间的传承关系。

进一步观察，苏、刘还有以下诗句之间存在着渊源或联系，笔者择其显要者予以摘录，制成表格如下^②：

苏 轼		刘禹锡	
诗 题	诗 句	诗 句	诗 题
次韵答元素(卷二一)	不愁春尽絮随风， 但喜丹砂入颊红。	春尽絮飞留不得， 随风好去落谁家？	杨柳枝词九首(其九，卷二十七)
将官雷胜得过字，代作(卷十八)	今朝从公猎， 稍觉天宇大。	俯观群动静， 始觉天宇大。	客有为余话登天坛遇雨之状因以赋之(卷二十三)
《虔州八境图》八首(其二，卷十六)	涛头寂寞打城还， 章贡台前暮霭寒。	山围故国周遭在， 潮打空城寂寞回。	金陵五题·石头城(卷二十四)
次韵秦少章和钱蒙仲(卷三十一)	山围故国城空在， 潮打西陵意未平。		
城南县尉水亭得长字(卷十九)	泽国山围里， 孤城水影傍。		

①胡仔：《茗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刘宾客”下引，第13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②以下表格中苏诗据中华书局王文诰辑注本《苏轼诗集》引，刘诗据中华书局1990年版《刘禹锡集》引。

续表

苏 轼		刘禹锡	
诗 题	诗 句	诗 句	诗 题
吊天竺海月辩师三首 (其一,卷十)	今夜生公讲堂月, 满庭依旧冷如霜。	生公说法鬼神听, 身后空堂衣不扃。 高坐寂寥坐漠漠, 一方明月可中庭。	金陵五题·生公讲堂(卷二十四)
次韵王巩南迁初归二 首(其二,卷二十二)	江家旧池台, 修竹围一尺。	青松郁成坞, 修竹盈尺围。	裴祭酒尚书见示春归城南青松 坞别墅寄王左丞高侍郎之什命 同作(卷二十三)
	归来万事非, 惟见秦淮碧。	南朝词臣北朝客, 归来唯见秦淮碧。	金陵五题·江令宅(卷二十四)
述古闻之,明日即至, 坐上复用前韵同赋 (卷九)	仙衣不用剪刀裁, 国色初酣卯酒来。	郢人斤斫无痕迹, 仙人衣裳弃刀尺。	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 篇因以答贶(卷三一)
卧病逾月,请郡不许, 复直玉堂。十一月一 日锁院,是日苦寒,诏 赐宫烛法酒,书呈同 院(卷二九)	醉眼有花书字大, 老人无睡漏声长。	此夜独归还乞梦, 老人无睡到天明。	酬仆射牛相公晋国池上别后至 甘棠馆忽梦同游因成口号见寄 (卷三六)
今年正月十四日與子 由别於陈州五月子由 复至齐安未至以诗迎 之(卷二十)	早晚青山映黄发, 相看万事一时休。	耦耕若便遗身老, 黄发相看万事休。	重答柳柳州(遗诗目录)
伯父《送先人下第归 蜀》诗云:人稀野店休 安枕,路入灵关稳跨 驴。安节将去,为诵此 句,因以为韵,作小诗 十四首送之(其五,卷 二十一)	晚岁俱黄发, 相看万事休。		
次韵王忠玉游虎丘三 首(其三,卷三十一)	若共吴王斗百草, 使君未敢借惊鸿。	若共吴王斗百草, 不知应是欠西施。	白舍人曹长寄新诗有游宴之盛 因以戏酬(卷三十一)
书林次中所得李伯时 《归去来》《阳关》二图 后(其一,卷三十)	不见何戡唱渭城, 旧人空数米嘉荣。 龙眼独识殷勤处, 画出阳关意外声。	唱得凉州意外声, 旧人唯数米嘉荣。 近来时世轻先辈, 好染髭须事后生。	与歌者米嘉荣(卷二十五)
		二十余年别帝京, 重闻天乐不胜情。 旧人唯有何戡在, 更与殷勤唱渭城。	与歌者何戡(卷二十五)

续表

苏 轼		刘禹锡	
诗 题	诗 句	诗 句	诗 题
闻李公择饮傅国博家大醉二首(其二,卷十六)	不肯惺惺骑马回,玉山知为玉人颓。	寂寂独看金烬落,纷纷只见玉山颓。自羞不是高阳侣,一夜星星骑马回。	扬州春夜李端公益张侍御登段侍御平仲密县李少府暘秘书张正字复元同会于水馆对酒联句追刻烛击铜钵故事迟辄举觥以饮之逮夜艾群公沾醉纷然就枕余偶独醒因题诗于段君枕上以志其事(卷二十四)
次韵王滁州见寄(卷三十四)	教得滁人解吟咏,至今里巷嘲轻肥。	化得邦人解吟咏,如今县令亦风流。	答东阳于令寒碧图诗(卷二十五)
送张职方吉甫赴闽漕六和寺中作(卷七)	门前江水去掀天,寺后清池碧玉环。	竹含天籁清商乐,水绕庭台碧玉环。	尉迟郎中见示自南迁牵复却至洛城东旧居之作因以和之(卷二十四)
张竞辰永康所居万卷堂(卷四十五)	清江萦出碧玉环,下有老龙千古闲。		
张子野年八十五,尚闻买妾,述古令作诗(卷十一)	柱下相君犹有齿,江南刺史已无肠。	司空见惯浑间事,断尽苏州刺史肠。	赠李司空妓(遗诗目录)
柳氏二外甥求笔迹二首(其一,卷十一)	君家自有元和脚,莫厌家鸡更问人。	柳家新样元和脚,且尽姜芽敛手徒。	酬柳柳州家鸡之赠(卷三十七)
书艾宣画四首·竹鹤(卷三十)	此君何处不相宜,况有能言老令威。谁识长身古君子,犹将缁布缘深衣。	依依似君子,无地不相宜。	庭竹(卷二十五)
颍州初别子由二首(其一,卷六)	意行无坎井,有如醉且坠。	腰斧上高山,意行无旧路。	蛮子歌(卷二十六)
九日次定国韵(卷三十五)	意行无车马,倏忽略九州。		
王晋卿所藏《著色山》二首(其二,卷三十)	萃确何人似退之,意行无路欲从谁。		
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卷八)	他年刘郎忆贺监,还道同时须服膺。	高楼贺监昔曾登,壁上笔踪龙虎腾。……偶因独见空惊目,恨不同时便伏膺。	洛中寺北楼见贺监草书题诗(卷二十四)

续表

苏 轼		刘禹锡	
诗 题	诗 句	诗 句	诗 题
监洞霄宫俞康直郎中所居四咏·逸堂(卷十一)	新第谁来作并邻， 旧官宁复忆星辰。	朝驱旌旆行时令， 夜见星辰忆旧官。	早春对雪奉寄澧州元郎中(卷二十四)
与舒教授、张山人、参寥师同游戏马台，书西轩壁，兼简颜长道二首(其二，卷十七)	竹杖芒鞋取次行， 下临官道见人情。	安知从复道， 然后见人情。	古调二首(其一，卷二十一)
和张耒高丽松扇(卷二十九)	犹胜汉宫悲婕妤， 网虫不见乘鸾子。	上有乘鸾女， 苍苍网虫遍。	团扇歌(卷二十六)
送钱藻出守婺州得英字(卷六)	东阳佳山水， 未到意已清。	东阳本是佳山水， 何况曾经沈隐侯。	答东阳于令寒碧图诗(卷二十五)
次韵答王定国(卷十六)	每得君诗如得书， 宣心写妙书不如。	两传千里意， 书札不如诗。	酬乐天初冬早寒见寄(卷三十二)
送张天觉得山字(卷二十九)	晴空浮五髻， 晦霭卿云间。	晴空礼拜见真像， 金毛玉髻卿云间。	送僧仲副东游兼寄呈灵澈上人(卷二十九)

皎然《诗式》曾有所谓偷语、偷意和偷势之说，以上这些诗句便分别在语、意、势等层面与刘诗相关联，颇能说明刘禹锡诗歌对苏轼创作所产生的影响。如“山围故国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归来万事非，惟见秦淮碧”、“晚岁俱黄发，相看万事休”、“不肯星星骑马回，玉山知为玉人颓”等句，可以明显看出苏轼学习和借鉴刘诗的痕迹。正是由于苏轼对刘诗如此频繁地取法，他们在笔法和风格上常显近似之处，故而邢敦夫有云：“‘扫地烧香闭阁眠，簟纹如水帐如烟。客来梦觉知何处？挂起西窗浪接天。’此东坡诗也，尝题于余扇，山谷初读以为是刘梦得所作也。”^①

其实，自宋开始就有不少人着手从具体作品中去发现刘、苏两人的共性或联系，如吕祖谦，注意到苏轼“犹胜汉宫悲婕妤，网虫不见乘鸾女”句是仿禹锡《团扇歌》“上有乘鸾子，苍苍网虫遍”而作^②，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二云：苏轼“赋诗有‘尤物已随清梦断’之句，盖用刘梦得《九华山歌》云：‘九华山，自是造化一尤物，焉能籍甚乎人间？’”宋人黄彻于此关注得比较多，所论亦时有发明，如：

梦得“酌我莫忧狂，老来无逸气”，乃倒用盖次翁“无多酌我”。“寄谢稽中散，予无甚不堪”，倒用《绝交论》。坡云：“后生可畏吾衰矣，刀笔从来错料尧。”周昌以赵尧刀笔吏，后果无能为，所料信不错。而云“错料尧”，亦以涉讥谤倒用尔。又有“穷鬼却须呼”，“乃知饭后钟”，“阁黎盖具眼”，“他年五君咏”，“山王一时数”，皆倒用也。

① 《王直方诗话》“东坡诗书邢敦夫扇”，郭绍虞《宋诗话辑佚》第56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② 《诗律武库》卷六《仙道门·秦女乘鸾》，吴文治《宋诗话全编》第六册第638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东坡)《寄参寥问少游失解》云：“底事秋来不得解，定中试与问诸天。”盖刘禹锡《和宣上人贺王侍郎发榜后》诗云：“借问至公谁印可，支郎天眼定中观。”不惟兼具儒释，又政属科场事，其不泛如此^①。

他们分别从诗歌的技巧、意趣、语言等方面发现了苏轼和刘禹锡两人诗歌之间的渊源和联系。另外，刘禹锡《石头城》中“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一句，曾被白居易推称为后人不复措词，苏轼不止一次化用，特别是“山围故国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后人议论颇多，如宋人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云：

读古人诗多，意有所喜处，诵忆之久，往往不觉误用为己语。……如苏子瞻“山围故国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此非误用，直是取旧句纵横役使，莫彼我为辨耳！

明人焦竑《焦氏笔乘》卷四“子瞻用禹锡诗”条云：

刘禹锡诗：“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乐天叹为警绝。子瞻云：“山围故国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则又以己意斡旋用之，然终不及刘。大率诗中翻案，须点铁为金手，令我诗出而前语可废始得。

或以为苏不及刘，为之惋惜；或认为苏轼以意驱使、纵横旧句，而赞其才气。我们无须赘言评判其高下，但可以说，苏轼“山围故国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一句为他对刘禹锡诗歌的创作接受作了最好的代言。

三、“虚静”与“象外”：苏轼对刘禹锡诗歌创作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苏轼和刘禹锡的文学思想也有相通之处，从中，我们亦可看出刘禹锡对苏轼的影响。

其一，“虚静”成诗。

由于刘禹锡“事佛而佞”^②，思想上受佛学的深刻影响，因此他在诗歌创作上非常重视虚静的作用。其《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引言云：

梵言沙门，犹华言去欲也。能离欲则方寸地虚，虚而万景入，入必有所泄，乃形乎词。词妙而深者，必依于声律。故自近古而降，释子以诗闻于世者相踵焉。因定而得境，故倏然以清。由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信禅林之蕊萼，而诚河之珠玑耳。

在这里，刘禹锡引申佛禅义理，阐述了虚静成诗的创作理论。虚、定、慧在佛禅术语中大意指一种超尘脱俗、空无寂静的精神境界。由于它和文学家、艺术家进行创作构思时所具备的精神状态有相通一致的地方，所以被作者援引，以阐述其与诗歌创作的关系。在刘禹

^①分别见于《碧溪诗话》卷四、卷七、卷八，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第364、378、387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刘禹锡集》卷二十九《送僧元嵩南游引》，中华书局1990年版。

锡看来，“虑静境亦随”^①，只要摈弃了一切欲望和杂念，使自己的心灵保持一种虚无澄静的状态，就能接纳客观万象、进而提炼加工出“词妙而深”并“依于声律”的诗歌。他认为：“槃高孕虚，万景垒来。词人处之，思出常格；禅子处之，遇境而寂。”^②正因禅子能“寂”、能“静”，故自古至今“释子以诗闻于世者”甚多。他们在构思时专注不散、摈虑静思，于是能空灵寂静、进入一种无拘无束和非常自由的创作境界，从而写出词丽境清、不同凡响的作品。

这一文艺思想后来被苏轼进一步发展，其《送参寥师》诗说：

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诗法不相妨，此语更当请。

要作出好诗，就必须要有“空且静”的创作状态。为什么呢？因为静能“了群动”，空能“纳万境”，意思是说诗人在空静的状态下，不仅能更好地了解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还能把现实世界里各种境界统统摄取，供自己作为创作素材驱使和运用。在“纳万境”、对万物了然于心的基础上，诗人“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更深入地体察人间百态、自然风景乃至个人本身，就会创作出蕴涵“至味”的精妙诗歌。显然，苏轼和刘禹锡都重视诗歌创作中“虚静”的作用，但所论又各有不同的特色。他们都强调“虚而万景入，入必有所泄”这样一个从占有材料、到选择提炼成诗的创作过程，但刘禹锡更多地将其与诗歌的审美形式（“依于声律”、“粹然以丽”）和美学境界（“翛然以清”）联系起来，体现的是一种诗学追求和诗性美，而苏轼更注重的是写作中对创作对象内在规律的静照和观察（“了”、“阅”、“观”），对世间百味、“至味”的体会和把握，体现的是一种理学趣味和理性美。

其二，“象外”之境。

意境是中国古代诗歌美学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理论范畴，它的发展和成熟历经了不同时代、不同论者的实践和努力，刘禹锡和苏轼都是其中之一，所以在客观上也存在着理论渊源关系。刘禹锡《董氏武陵集纪》云：

诗者，其文章之蕴邪！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

在刘禹锡的文学观念中，诗、文和著述通常都是分开来看的，他在《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纪》中说：“谨按公未为近臣以前，所著词赋、赞论、记述、铭志，皆文士之词也，以才丽为主。自入为学士至宰相以往，所执笔皆经纶制置财成润色之词也，以识度为宗。”诗和文虽然都是“以才丽为主”，可是分别来说，它们也是不同的，其《唐故尚书主客员外郎卢公集纪》云：“心之精微，发而为文；文之神妙，咏而为诗。”“诗者，文章之蕴邪”，也就是说诗歌比文章更精炼、含蓄和更富有韵味。正是认识到了诗歌不同于一般文章的审美特征，刘禹锡紧接着才对诗歌的独特魅力——意境作了非常凝练和确切的理论概括。“义

① 《刘禹锡集》卷二十三《和河南裴尹侍郎宿斋太平寺诣九龙祠祈雨二十韵》，中华书局1990年版。

② 《刘禹锡集》卷九《洗心亭记》，中华书局1990年版。

得而言丧”、“境生于象外”则是就诗的意境和意境创造而言的。“义得而言丧”，就是说诗歌具有言外之意和“得意忘言”之妙，需要读者从字句之外去体会其含蓄不尽的意味；“境生于象外”，指意境存在于诗歌中有形的、具体的景象描写之外，它是一个虚的、但比实的景象描写更加醇美广阔的艺术境界，要求读者用自己的想像去补充它、丰富它。总的来说，意与境须借助于语言和物象来完成，但还应高出语言、物象等浅表因素，进而达到“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的诗歌境界。

刘禹锡之后，晚唐的司空图提出了“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和“味外之旨”、“韵外之致”等著名的美学概念，对诗歌意境创造及其审美特征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论述。位于司空图之后、南宋严羽之前，对意境理论最有创见和贡献的人就是苏轼。他不仅在具体的诗歌鉴赏和评论中，以“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发纤秣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等经典性的话语对诗歌意境作了最形象的阐述，还把意境由诗学领域延伸到了绘画、书法等艺术领域，大大拓展了其蕴涵，使其成为一种以诗画为中心、在各个艺术领域皆具有指导性和适用性的艺术理论。他明确地以是否具有“象外”之趣来评价他人的画作，如在《王维吴道子画》中，苏轼说：“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认为吴道子的画虽工，但王维的画具有象外之境，所以仍超过了吴道子。又如《题文与可墨竹》，在赞扬文与可“诗鸣草圣余，兼入竹三昧。时时出木石，荒怪轶象外”时，也点出了“象外”之旨。苏轼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这“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其实也就是超越了诗歌和画面中具体的语言层面和物象层面，通过想象、玩味而体会和构建的言外之意和象外之境。与“义得而言丧”、“境生于象外”相比较，苏轼的“象外”不仅显示出他与刘禹锡之间的相通之处和前后继承关系，更突出亦更可贵的是他对意境论的丰富实践和全新拓展。

由于政治观念及思想的差异，苏轼曾因刘禹锡和柳宗元参加永贞革新一事多次攻击他俩为“小人”，批评相当刻薄。但他在《续欧阳子朋党论》说：“唐柳宗元、刘禹锡使不陷叔文之党，其高才绝学，亦足以为唐名臣矣。”这说明：苏轼虽然指责、贬斥刘柳的政治作为，但仍对二人的才学还是充分肯定的，他在诗歌创作中对刘禹锡的借鉴和吸收、文学思想上对刘禹锡的继承和发展这一接受态度便充分佐证了这一点。由于苏轼本身在北宋文坛及整个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他的接受无疑是刘禹锡诗歌整个接受史上的重要一环。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王兆鹏